

亚历克斯·卡加梅的思想及非洲“民族志哲学”争鸣

邓皓琛

摘要：在批判比利时传教士唐普尔的基础上，卢旺达思想家卡加梅从语言素材入手，在《比较班图哲学》中从范畴、造物主、生命原则、历史观、祖先崇拜、人的目标等六方面勾勒出班图哲学，力图证明非洲哲学之存在。与同时代基督教的演变相呼应，卡加梅基于班图哲学中的核心理念，提出基督教应调整自身传教方式以更好地在非洲扎根的谨慎建议。卡加梅的哲学著作在非洲哲学界一度引发有关“民族志哲学”的激烈争鸣。批评者认为，以卡加梅为代表的“民族志哲学”不属于严谨哲学，且服务于传教。支持者认为，该派别是非洲思想的良好开端，不必拘泥于欧洲哲学的金科玉律。虽然带特定时代局限，但卡加梅的思想及其引发的相关争鸣丰富了我国学界对当代非洲哲学源与流的认识，并带来新启示。

关键词：亚历克斯·卡加梅；非洲哲学；民族志哲学

中图分类号：B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25）05-0080-94

随着中非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持续走深走实，非洲哲学已进入国内学界的研究视野。近年，越来越多代表性人物和重大议题受到关注。围绕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非洲哲学的内部争论，学界对比利时传教士普拉西德·唐普尔（Placide Tempels，以下简称唐普尔）、卢旺达思想家亚历克斯·卡加梅（Alexis Kagame，以下简称卡加梅）等人的开创性贡献已有涉猎。^①最近，有学者从非

作者简介：邓皓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① 张宏明是国内学界最早讨论当代非洲哲学起源的学者，并对比利时传教士唐普尔的《班图哲学》和卡加梅的《比较班图哲学》分别进行过专门研究。参见张宏明：《唐普尔的〈班图哲学〉及其对非洲哲学研究的影响》，载《西亚非洲》1988年第6期；张宏明：《非洲“人种哲学”的先驱：卡加梅哲学思想解读》，载《西亚非洲》2001年第4期。德国学者基姆勒出版于2011年的有关非洲当代哲学的介绍性著作亦已被翻译至国内，参见海因兹·基姆勒：《非洲哲学：跨文化视域的研究》，王俊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洲哲学流派的全景图把握卡加梅的位置。^①在前人基础上，本文拟从被称为“非洲民族志哲学先驱”的卡加梅入手，梳理他对班图哲学的系统阐发，辨析其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比较班图哲学》的落脚点，回顾非洲学界有关“民族志哲学”（Ethnophilosophie）^②的理论争鸣，以准确评价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思想界领军人物具有特定时代烙印的贡献及其引发的相关争鸣的多重含义，丰富学界对当代非洲哲学在源和流两方面的认识。

一、受唐普尔启发的卡加梅

（一）卡加梅思想生涯的哲学分量

1912 年，卡加梅出生于卢旺达一个与王室关系密切的望族家庭。1928 年，他受洗为天主教徒，次年，进入神学院学习。1941 年，卡加梅进铎为神父。卡加梅年轻时已在鲁达希格瓦国王（King Rudahigwa）面前展露诗歌才华，受赏识后得以接触王家代代秘传的宫廷诗歌。该国王于 1943 年皈依天主教，为卢旺达史上首位受洗的国王，并将天主教列为国教。^③卡加梅的大多数著作围绕卢旺达的史学、文学和风俗展开，以卢旺达语和法语在国内外出版。1951 年，他成为比利时皇家海外学院院士。1951 年、1952 年和 1954 年，卡加梅相继出版了《卢旺达王朝诗歌》《卢旺达政治制度典章》和《古代卢旺达的社会家庭组织》。1952 年和 1955 年，卡加梅分别出版了两卷本鼓励卢旺达百姓皈依基督教的诗集《神圣牧歌》。1952 年，卡加梅赴罗马格里高利大学攻读哲学博士，1955 年以《班图卢旺达人的存在哲学》的论文获博士学位，次年在比利时出版该论文。1958 年卡加梅返回卢旺达后相继在神学院和卢旺达国立大学任教。1961 年和 1963 年，他相继出版了《古代卢旺

① 李安山：《当代非洲哲学流派探析》，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0 年第 2 期，第 138 页。

② 本文第三部分将详细讨论“民族志哲学”的争鸣。此处需说明我们对“Ethnophilosophie”的中文翻译的考虑。该法语新词指在非洲民族志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某一族群的文化和意识进行提炼的哲学书写。张宏明早在 2001 年研究卡加梅的哲学时用“人种哲学”来翻译法语“Ethnophilosophie”。王俊在 2016 年翻译《非洲哲学：跨文化视域的研究》一书时用“部族哲学”来翻译它。李安山在 2020 年梳理当代非洲哲学版图时对“民族哲学”“部族哲学”或“人种哲学”的用法大体不持异议。诚然，若只从构词方式考虑，法语、英语前缀“ethno-”确实可以翻译为“人种”“部族”或“民族”。但是，若以“人种哲学”译之，中文读者容易误以为它源于特定的种族划分；若以“部族哲学”译之，容易误以为它仅关涉某些小规模原始部落和氏族，与当代非洲人无涉，与大共同体无关；若以“民族哲学”直译，容易误以为它等同于非洲独立前后席卷几乎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事实上，如本文第三部分将揭示的，“Ethnophilosophie”既非种族或生理意义上的分类，亦非只着眼于小共同体或偏安一隅的原始部落，也不是现实政治中的各国发展道路选择，而是当代学院派的一种哲学书写方式。因此，为忠于该概念在 70 年代创造时对民族志素材的强调及批判，同时也为了避免中文理解上的歧义，本文决定使用“民族志哲学”来翻译之。

③ 有关天主教在卢旺达的传播史，参见该国天主教会官方网站：<https://www.egliscatholiquerwanda.org/en/spip.php?article533>（2025-7-29）。

达牛群军队史》和《卢旺达前殖民时期的武装力量》，1972年和1975年又出版了两卷本的《卢旺达族群简史》，并于1976年出版了《比较班图哲学》。除上述代表著作外，他还发表多篇文章。20世纪70年代，卡加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为《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成员。1981年，卡加梅在肯尼亚逝世。

由上可见，卡加梅多数成果聚焦于文史。尽管其治学生涯直接涉及哲学的著作和文章不多，但卡加梅为哲学投入了大量精力，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他年轻时从语汇、民俗、口头诗歌入手钩沉卢旺达史，为日后从语言角度研究卢旺达思想打下坚实基础。思想成熟时期的卡加梅赴欧洲求学之所以选择卢旺达的存在哲学为博士研究方向，则直接受唐普尔于1945年出版的《班图哲学》^①的影响：如果不是该书，他很可能“会在留欧时选择其他方面的博士论题”^②。可以说，在已有丰硕成果的史学之外，卡加梅另辟新路，考察同属班图人的卢旺达人到底是否拥有属于他们的哲学。《班图卢旺达人的存在哲学》^③在比利时出版后便引起学界注意。而卡加梅对哲学的关切在其博士论文出版后也更为深远，不输其对史学的热忱。1958年，他积极在欧洲各大非洲研究的学术重镇搜集语言学和人种学研究材料。随后多年，他向同期旅欧非洲人、在非知识精英请教非洲多地的传统观念和语言表述，前后积近20年之功，把研究区域从卢旺达扩大到整个班图地区，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下出版体现其全部哲学观点的集大成著作《比较班图哲学》。

（二）对《班图哲学》的超越

在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班图哲学》的内容，以厘清卡加梅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受唐普尔影响。如唐普尔在书中坦言，该书写作动机是白人传教士在卢巴族地区、乃至整个比属刚果的传教活动受挫后对当地人精神世界的探索和反思。它面向的读者，是在殖民地引领当地人走向文明、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统治者和传教士。^④在唐普尔看来，基督教的教义并非注定和非洲人水火不容，只是欧洲人从未细心研究过他们的精神世界，找不到合适的传教接驳口和突破点。如果传教士可以在人类学家对非洲人作描述性记录的基础上迈出关键一步，透彻研究他们的精神世界、形而上学和本体论，那么便能有针对性地让基督教扎根非洲。^⑤

① 比利时传教士唐普尔在20世纪30—60年代初在比属刚果传教。他最初在1945年用弗莱芒语于比属刚果出版《班图哲学》，该书随后在1949年由法国著名“非洲在场”出版社出版法译本。本文使用该书的法译本。Placide Tempels (1945), *La Philosophie Bantoue*, trans. A. Rubbens,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1949.

② Alexis Kagame, *La Philosophie Bantu Comparée*,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1976, p. 7.

③ Alexis Kagame, *La Philosophie Bantu-rwandaise de l'Être*, Mémoire in-8°, AC. R. Sc. Col., Classe Sc. Morales et politiques, n°spécial, XII, fasc. 1, Bruxelles, 1956.

④ Placide Tempels, *La Philosophie Bantoue*, p. 109.

⑤ 张宏明在研究非洲传统宗教时亦提及唐普尔写作《班图哲学》的传教目的，但可惜未能对此展开讨论。参见张宏明：《非洲传统宗教的学术境遇和学术争鸣》，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28页。

具体来看，唐普尔认为当地人有着迥异于欧洲人的“生命力”(force vitale)本体论。在当地宇宙观中，万物皆承载某种生命力，只有生命力才是存在的本质。“存在，即力量；力量，即存在。”^①而且，生命力是可以消长增减的。人，是宇宙中心，其存在目的便是汲取外物以增强自身生命力。基于此，唐普尔认为，尽管当地人的精神世界大体上是尘世、缺乏彼岸概念的，但基督教本身也有关注生命、渴望强化生命的元素，且信众也接受“上帝以其丰沛的活力造物”这一说法，因此传教士倘若用心引导，基督教完全有机会扎根到非洲人的精神世界中。^②

以今天的眼光观之，唐普尔是明确提出班图人拥有自身思想、并试图对之进行系统研究的西方先驱。他以学理方式肯定了非洲哲学的存在，影响了包括卡加梅在内的大批非洲知识精英，在欧洲也掀起了一定正面的声势。不过，从严谨角度来看，唐普尔笔下的“班图人”其实沿用当时欧洲人类学界约定俗成的用法，泛指“非洲人”，而非语言学、民族学分类上非洲中南部地区操班图语的各民族。若再考虑到他的传教动机，那么《班图哲学》既没有以幅员辽阔的班图地区为研究范围，也没有首先着眼于哲学，可谓既不“班图”，也不“哲学”。年轻的卡加梅没有亦步亦趋附和《班图哲学》。固然，他肯定了唐普尔开一代风气之先，赞其为在殖民者普遍视非洲人只有原始思维的背景下提出非洲拥有哲学的第一人。然而，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与比利时友人的通信中，卡加梅已对该书持有异议。^③而在《班图卢旺达人的存在哲学》开篇，卡加梅暗示自己与唐普尔分道扬镳：“既然唐普尔在1945年出版的这本《班图哲学》引起热议，那么由一位来自非洲班图地区的本土人来验证比利时传教士提出的理论，可谓顺理成章。”^④到了《比较班图哲学》，他更直率地指出唐普尔在方法论上的致命盲点：首先，唐普尔本该避免落入人种学描述性观察的窠臼，应选取某一特定区域，先研究该区域里语言、制度、民间故事、口头记述和谚语等蕴含的哲学因素；其次，再从这一特定区域推广至整个班图文化圈，以验证在特定区域里挖掘出的哲学因素到底是否存在于整个班图文化圈，方可作为“班图哲学”是否存在下定论。^⑤换言之，卡加梅批评《班图哲学》的研究范围过窄，结论无法推广至整个班图区域。在他看来，唯有真正覆盖整个班图文化圈的研究，方有可能提炼出名副其实的“班图哲学”。唐普尔无法做到的，恰是卡加梅横跨近20年，从《班图卢旺达人的存在哲学》到《比较班图哲

① Placide Tempels, *La Philosophie Bantoue*, p. 36.

② Ibid., pp. 121—123.

③ 1953年2月10日，在与另一位比利时神父 Gustaaf Hulstaert 的通信中，卡加梅明言：“我一直都不同意唐普尔的观点。”参见 Honoré Vinck, “Correspondance Hulstaert-Kagame: 1944—1957,” *Annales Aequatoria*, 1985, Vol. 6, p. 184.

④ Alexis Kagame, *La Philosophie Bantu-rwandaise de l'Être*, p. 8.

⑤ Alexis Kagame, *La Philosophie Bantu Comparée*, p. 7.

学》所践行的方法论：为避免同一人“既搜集民族志素材，又对这些素材加以阐释”^①的缺陷，卡加梅从语言素材入手，踏出一条研究非洲哲学的新路。从这个意义上看，卡加梅与唐普尔的思想关系主要是发生学意义上的，而绝非研究主题上的直接继承。^②

二、卡加梅对班图哲学的整体勾勒及落脚点

早在《班图卢旺达人的存在哲学》中，卡加梅便提出：“卢旺达不曾有人专门记录下哲学问题及其相关素材，所以不能认为以前有过哲学家。但本文分析研究的素材，必定是形成于过去某个时刻的素材，因此我们可以说卢旺达拥有一些直觉上的哲学家（des philosophes intuitifs），他们触及到存在的根本问题，为其提供了一套完备词汇，只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所起的作用而已。”^③作为有明确哲学意识的学者，卡加梅的使命便是要在卢旺达的词汇、谚语、寓言、传说、诗歌等诸种语言元素中挑明那些自在自为的哲学思想。放眼至整个班图地区，卡加梅对这种“没有哲学家的哲学”（une philosophie sans philosophes）^④有更深体认。在他看来，班图哲学已绵延数千年，早期班图人不知不觉地铺垫下哲学的基石，而一代又一代人又以不自知的方式浸淫在这种哲学中：“恰是凭借这种哲学，且内在于这种哲学，人们才可以设想人在地球上存在的开端、过程和结束，才可以赋予各种事物所承担的角色，才可以阐释宇宙的本质。”^⑤由此，卡加梅心目中的班图哲学是以某种集体意识的方式恒久存在的，只待有心人将其揭示出来。与《班图哲学》大不相同，《比较班图哲学》既严谨划定了研究对象的地理和文化空间，又从各班图民族的思维特点中提取最大公约数，可谓是既“班图”又“哲学”。鉴于此，本部分将按《比较班图哲学》的行文顺序，分别以范畴、造物主、赋予智慧的生命原则、历史观、祖先崇拜和人的终极目标共六小节概述班图人的精神世界。第七小节简述卡加梅对唐普尔“生命力”学说的质疑。第八小节重点回顾有关基督教能否在非洲扎根这一落脚点。

（一）范畴

卡加梅构建班图语言结构与哲学思维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对以词类为特征各班图语词类进行还原归并后，提出班图思维的四大基本范畴，分别为：“人”“物”“空间—时间”和“存在方式”。任何一种存在物都可以归入这四大范畴中。以“存在”的词根“ntu”为例，它对应的四大范畴为：Muntu、Kintu、Hantu

① Alexis Kagame, *La Philosophie Bantu-rwandaise de l'Être*, p. 24.

② 直到今天，许多非洲本土的哲学工作者依然把卡加梅视为唐普尔理所当然的追随者，看不到卡加梅在多个维度与唐普尔的分歧。

③ Alexis Kagame, *La Philosophie Bantu-rwandaise de l'Être*, pp. 37—38.

④ Alexis Kagame, *La Philosophie Bantu Comparée*, p. 286.

⑤ *Ibid.*, p. 306.

和 Kuntu。在这里，“人”和“物”的范畴对应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实体范畴；“空间—时间”对应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相互独立的空间范畴和时间范畴；“存在方式”对应数量、性质、关系等范畴。对结合在一起的“空间—时间”范畴，卡加梅为这一语法特点提出形而上学解释。在他看来，每一个存在物都在不为外界觉察的情况下沿自身存在轨迹运动，处于存在物自身独一无二的个体分化过程中（individualisation）。于是，唯有同时结合空间和时间的范畴方可描述这种既不同于过往，亦不同于将来的当下分化运动。^①

从更大的意义来看，虽然班图人一般不从日常用语中追溯某一范畴的思想内涵，但卡加梅从比较的角度阐释口头传统的优势。恰是这种未经反思却经由班图人代代亲历的集体深层思维才具备那些由书面文明承载，并经哲学家个体阐释的思维所没有的优势，反倒是“书面文明传统中某个体的阐释一旦出错，这一错误便要从古到今流传下来，并且还伴随种种有关这种错误的纠正和反驳”^②，而没有文字的文明则不需受此困扰。

（二）造物主

卡加梅指出，班图人精神世界中的造物主，或者西方人惯常称为的“最高存在”“第一因”，并非一种存在物，故不属于上述四大范畴。造物主乃一“先存物”（Pré-existant）。尽管无法归入某一范畴，但不同地区的班图人依然可以通过诸如“开启者”“全能者”“行动者”等属性来认识造物主。在形而上学层面，造物主是唯一、不可分的。哪怕人类学家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往往会碰到多神或把祖先称为“神”的表述，但这些神仍然有唯一一个创造他们的共同源头。

作为一名虔诚基督徒，卡加梅还纠正西方传教士对班图人的神的偏见。例如，在部分传教士认为班图人并不在特定地方供奉神的问题上，他驳斥这种先入为主，带基督教色彩的偏见，提出班图人的神已经充盈于天地之间，故人们没有必要另造专门的祭祀场所来供奉神。^③又如，针对部分传教士宣称班图人的神并不介入班图人的日常事务，卡加梅反驳：班图人的神是种种禁忌戒律的守护者，对每个个体的一言一行都了然于胸，因此会扬善惩恶，掌握善人和恶人的生死大权。^④

（三）赋予智慧的生命原则

班图人特有的“赋予智慧的生命原则”（principe vital d'intelligence）体现为智力和意志两大能力。就智力水平而言，班图人的智力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大致

① Alexis Kagame, *La Philosophie Bantu Comparée*, pp. 117—124. 卡加梅对班图人思维的“四范畴说”并非在 1976 年著作中首提，而是在他 1956 年研究卢旺达人思维世界时已系统提出。只不过，卡加梅在 1976 年经大量语言学材料印证后，将 20 年前只着眼于一地的结论推广至广大班图地区。

② Ibid., p. 171.

③ Ibid., p. 291.

④ Ibid., p. 293.

一样，无独特差别。他们凭智力可以认识善恶，但却要由意志对善恶作出选择。在卡加梅看来，意志才是人类行为的动力因。^① 如果该原则和人的躯体结合，那么人便被赋予思考的智慧；反之，如果该原则脱离躯体，人便归于死亡。而且，尽管作为个体的人必须经历生老病死，但作为抽象层面的“赋予智慧的生命原则”则能以一种非物质的方式生而不灭。

此外，与基督教的永生或古希腊的“灵魂不灭”观念不同，在班图人的世界观中，人死后既无法永生，亦无法像传教士所猜测的那样转世再生。因此，普通班图人有着强烈的自我保存本能，对生存有着无限欲望，能够把握绵延不断、永无终止的“赋予智慧的生命原则”^②。

（四）历史观

在卡加梅看来，班图人个体意义上的时间观和集体意义上的历史观有着某种同构类比。个体反映的是他身处社会的文化，承载着过去到现在的信息，是诸位祖先留下的传统。类比到集体，当下一代人已身处有所建树的前人荫泽之下。而前人也清楚意识到自己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有用的馈赠，且后人也同样会把这笔馈赠传递到他们的后人中。于是，某一代人就不纯然是健在的这批人，而是通过继承前人才得以拥有当下一点一滴的一代人，且意识到存在于面向未来的代际绵延中，也就是与前人和后人血脉相连。于是，卡加梅不把历史定义为过去发生的事件，而是将其视作“在过去迸发，并在当下仍然发生作用的事件”^③。为说明过去和现在的密切联系，他以项链为喻，提出每一代人都像是项链上的一颗珍珠，但某一代人几乎不可能仅凭一颗珍珠就改变整个项链的造型。

在对未来的态度上，卡加梅提出：尽管班图人确信时间之不可逆，且有未来的概念，但由于班图文明并不像基督教那样有明确的末世，因此班图历史观中的未来并无一个“确凿的终点”^④。换言之，班图人的历史没有一个清晰的指向。同时，他借卢旺达的王朝更迭，提出在线性不可逆的时间之外还存在循环往复的周期，两者合力形成螺旋式的历史发展轨迹。如此一来，便可理解何以卡加梅向非洲第一位提出时间问题的肯尼亚神学家约翰·姆比提（John Mbiti）致敬的同时，却又客气地批评姆比提采用民族志而非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含蓄表达不认可姆比提在 1969 年提出“非洲人的时间观不存在未来”之论调。^⑤

① Alexis Kagame, *La Philosophie Bantu Comparée*, p. 278.

② Ibid., p. 256.

③ Ibid., p. 176.

④ Ibid., p. 177.

⑤ 卡加梅提到，本来希望借用姆比提有关非洲时间观的素材，但由于他与姆比提的方法论有所不同，故最终没有使用。参见 Alexis Kagame, *La Philosophie Bantu Comparée*, p. 179, note 1。有关姆比提在非洲哲学的部分贡献，参见李安山：《当代非洲哲学流派探析》，第 139 页。

（五）祖先崇拜

不同于西方文明有关祖先的概念，班图人相信祖先能够以分别存在于不同躯体的方式真实存在于当下，藏身于山林、河流、地底等地，且时刻可以介入他们的日常生活。^①于是，对待前人需要虔诚、庄重，否则前人将会对今人施加惩罚。而且，班图人往往把祖先介入当下事务想象为造物主显灵，执行造物主的意志。换言之，祖先是当下的人与神之间的中介角色。

针对传教士记录的班图祖先崇拜，卡加梅力图厘清班图人对西方所谓“偶像崇拜”的不同理解。诚然，传教士容易把对某一雕像赋予神性，进而对之崇拜的行为称为“偶像崇拜”。但在班图人的观念中，尽管两者有诸多相似，但对祖先的崇拜与对西方造物主的崇拜其实分属两个不同层次：对祖先的崇拜更多体现为尘世对祖先的尊敬，而对造物主的崇拜才带有超越性的情感。^②

（六）人的终极目标

卡加梅以西方和班图人的比较视角来讨论班图人的终极目标。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下，人的终极目标是认识和热爱上帝。而卡加梅则发现：留下子嗣，才是班图人的终极目标；死而无后，才是人最大的不幸。^③确切来说，这一终极目标是在集体层面延续班图人的血脉，而就个体层面而言，个体只是介乎于祖先和后人之间的一环。

这种一切围绕人的传统信仰有着与基督教完全不一样的伦理规范：人们要遵守传统信仰的法则，以避免子嗣遭惩罚；祖先时时关注后人，保佑血脉延续；造物主关注个体一举一动，扬善惩恶。在卡加梅看来，以血脉延续为终极目标有一重要影响，便是建立起班图人强烈的血缘共同体意识。无论是和外族进行友好往来，还是订立盟约，血缘共同体都在力图扩大自身血脉，哪怕西方的个人主义也无法阻止班图人血缘共同体的扩张。^④

（七）批驳唐普尔的“生命力”学说

围绕被唐普尔视为最能区分班图人和欧洲人的所谓“生命力”学说，卡加梅认为唐普尔不能仅靠在卢巴人地区的局部调研就把“生命力”学说推广至整个班图地区。在他看来，在一般意义上，增强生命力并不是某地某族独有的思维，而是全人类皆有的普遍愿望。无论是自然意义上的生老病死，还是社会意义上的经济条件和等级地位，人都渴求达到更高、更强的位置。至于哲学层面的“生命力”，卡加梅认为这是“健在的存在物展现其本质的能量”^⑤。这种能量在每个人

① Alexis Kagame, *La Philosophie Bantu Comparée*, p. 264.

② Ibid., pp. 302—303.

③ Ibid., p. 286.

④ Ibid., p. 288.

⑤ Ibid., pp. 210—218.

体内是固有和恒定的，不随个人年龄和健康状态而改变。为进一步驳斥唐普尔的“生命力”学说，卡加梅还援引同时代多位非洲学者对这一学说的评价，表明《班图哲学》并不能如实反映非洲思想。^①

（八）卡加梅对基督教在非洲扎根的态度

在本书最后一章，卡加梅对基督教有三层思考。首先，他批判西方传教士及部分非洲神父无视班图文明、自以为是的心态。以卢旺达对神的传统词汇为例，卡加梅尖锐指出，西方传教士把东非斯瓦西里语中的“Mungu”（神）强行移植到卢旺达的信众里，而卢旺达语则一直以“Immana”表达“神”。^②如此一种术语上的生硬移植容易让普通卢旺达百姓产生抵触心理，认为白人殖民者的神取代了卢旺达传统的神。他又以大学和神学院的课程设置为例，批评依照欧洲模式培养出来的非洲神父往往在观念上已相当欧化，不知不觉主动模仿欧洲“高级文明”的言行举止，试图成为白人一分子。在这种自卑心态作怪下，很少再有非洲神父愿意研究连他们自己都不屑一顾的非洲“落后文明”。

其次，他对容易造成混淆的“基督教”和“欧洲文明”作出独特区分。卡加梅大胆提出：基督教不应独属于某一文明，尤其不独属于在技术上领先的欧洲文明。关于欧洲殖民者洋洋自得的所谓“基督教文明”（civilisation chrétienne），他试图作出表述上的更正，指出欧洲文明应被称作“接受了基督教的文明”（civilisation christianisée）。于是，既然基督教不独属于欧洲文明，那么班图文明和基督教的接触就不等同于班图文明和欧洲文明的高低碰撞，也就不会像欧洲中心主义者宣称的所谓落后文明接受先进文明。换言之，基督教和班图文明的相遇应为两套大致对等体系之间的对话。^③

最后，卡加梅就基督教能否扎根非洲提出谨慎建议。作为精通本地传统的人，

① 从对《班图哲学》诸观点的评价来看，卡加梅亦抱有质疑、商榷的态度。因此，不应粗略地把卡加梅的《比较班图哲学》和唐普尔的《班图哲学》混为一谈。

② Alexis Kagame, *La Philosophie Bantu Comparée*, p. 311. 关于卡加梅担忧“Mungu”取代“Immana”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从刚果（金）思想家姆丁贝对卡加梅身后的评价中得到确认。参见 Valentin Mudimbe, *Tales of Faith: Religion as Political Performance in Central Africa*, New York: Bloomsbury, 2016, p. 145.

③ Alexis Kagame, *La Philosophie Bantu Comparée*, pp. 312—314. 卡加梅的这一区分一定程度上为欧洲白人传教士洗脱了自“西”向“非”强迫传播基督教的历史责任，引起部分非洲学者的批判，参见 Chales Romain Mbele, *Le Ghetto Théocratique*, Paris: L'Harmattan, 2017, pp. 160—163. 必须指出，在非洲学界，大多数专门研究卡加梅的文章或学术著作均不提及《比较班图哲学》最后一章的内容。换言之，没有分析卡加梅的哲学写作与基督教的关系。这些著作有：Ntite Mukendi, “Langues Africaines et Vision du Monde (La Philosophie Bantou Comparée d'Alexis Kagame),” *Présence Africaine*, Vol. 3, No. 103, 1977; Dismas Masolo, “Language and Reality. Alexis Kagame.” in Dismas Masolo, *African Philosophy in Search of Ident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Liboire Kagabo, “Alexis Kagame (1912—1981): Life and Thought” in Kwasi Wiredu (ed.), *A Companion to African Philosophy*, New Jersey: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Bwanga Wa Mbenga Nyoli Boko, *La Philosophie du Langage d'Alexis Kagame. Contribution à la problématique de la philosophie africaine*, Paris: L'Harmattan, 2018.

他深知强行改变班图人的习俗传承是不切实际的，生硬禁止一切形式的祖先崇拜只会适得其反。对此，他提议传教士换一个角度看待班图人的祖先崇拜：正如基督徒也会在先人墓前献花，而且他们也会追忆和尊敬先人，那么传教士能不能稍作调整，把班图人的祖先崇拜接受为对先人的追忆和尊敬？因此，卡加梅设想，若基督教能有所本土化，那么祖先崇拜将不会构成基督教在非洲传播的障碍，反而会成为“通往基督教的桥梁和守望石”^①。

三、非洲“民族志哲学”争鸣中的卡加梅

由第二部分可知，《比较班图哲学》的写作出发点是纠正唐普尔的谬误，展现确凿存在的班图哲学，而落脚点则是尽可能找出班图文明与基督教的契合点。必须强调，卡加梅从非洲本土实际出发，对基督教通过自身调整从而更好地在非洲扎根的建议始终是小心翼翼、试探性的。和唐普尔在《班图哲学》中带着欧洲白人终能使班图人皈依基督教的自负语气大不相同，卡加梅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他既不怀揣班图文明落后于西方文明的自卑心理而急于鼓动非洲人摒弃自身传统，也不像唐普尔般坚信基督教终将赢得班图人心而急于号召传教士布道。不过，由于唐普尔、卡加梅先后均以“班图”为题出版阐释非洲哲学的著作，故非洲学界在讨论非洲哲学开端时往往把卡加梅笼统地描述为唐普尔的追随者乃至同路人。尤其在 20 世纪 70 年代非洲法语哲学界，以贝宁的保兰·洪通吉（Paulin Hountondji，以下简称洪通吉）、喀麦隆的马西安·托瓦（Marcien Towa，以下简称托瓦）和法比安·埃布西·布拉加（Fabien Eboussi Boulaga，以下简称布拉加）为首的一批哲学家将唐、卡二人一同视为“民族志哲学”的代表，认为“民族志哲学”算不上严谨意义上的哲学。用洪通吉在 1970 年不无讽刺的话来说，非洲哲学“有一位叫唐普尔的先驱。这位比利时传教士的《班图哲学》今天依然在某些人眼中属于‘非洲哲学’的经典。事实上，它是一份自以为有哲学色彩的民族志著作。倘若人们允许，我愿造一个新词来描述它：‘民族志哲学’（ethnophilosophie）”^②。在洪通吉看来，“民族志哲学”指“对那些恒久不变，普遍存在于非洲人的群体哲学作想象式的研究”^③。该表述甫一提出，便带有火药味，并广泛被那些批判“民族志哲学”的哲学家所使用。于是，唐普尔、卡加梅的非洲哲学著作立即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不过，自 1976 年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非洲哲学研讨会”以

① Alexis Kagame, *La Philosophie Bantu Comparée*, p. 318.

② 该文首次发表于 1970 年法国《第欧根尼》杂志，后收录于 Paulin Hountondji, *Sur la «Philosophie Africaine»: Critique de l'Ethnophilosophie*, Paris: Maspéro, 1977, p. 14.

③ Paulin Hountondji, *Sur la «Philosophie Africaine»: Critique de l'Ethnophilosophie*, p. 21.

来，一度饱受批判的“民族志哲学”却开始迎来一批支持者。参与讨论的思想家也从法语世界扩大到英语世界。他们视以卡加梅为首的“民族志哲学”是非洲哲学的一个良好开端，能让非洲哲学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哲学版图中立足。亟需批判的，反倒是那些批判“民族志哲学”的人：他们应反思自己是否食“洋”不化，带着欧洲哲学的“精英”标准来打量非洲同行的著作，落入“欧化”陷阱。因此，有为“民族志哲学”辩护的学者把洪通吉、托瓦、布拉加等人贬为“欧化派”（Europhilosophie）^①。至此，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非洲法语哲学圈形成了“欧化派”和“民族志哲学派”两大对立阵营。

简言之，有关“民族志哲学”的争鸣牵涉各方辩论之激烈，涉及学者范围之广，时间跨度之长，反映它在当代非洲哲学占据关键位置。不了解这场卡加梅深陷其中的争鸣，我们恐怕无法把握近 50 年非洲哲学的嬗变脉络。至于卡加梅本人，尽管他时刻关注非洲思想动态，但始终保持克制，从未在公开场合回应过外人批评。^②下面将梳理这场争鸣的各派观点。

（一）对“民族志哲学”的批判要点

第一，“民族志哲学”的落脚点在宗教，不在哲学。从批判运用理性的哲学角度观之，包括白人传教士唐普尔及卡加梅、穆拉戈等非洲黑人学者在内的“民族志哲学”更接近于用理性为基督教辩护，而对基督教教义本身却不作批判地加以接受。这是多位哲学家对“民族志哲学”最猛烈的批判。洪通吉就明言：“对班图思想的重构，无非是更好让这些班图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方式罢了。”^③无论是非洲本土传统中存在的有可能和基督教相接驳的所谓“守望石”，还是传教士所主动作出的“调整适应”，“民族志哲学”都服务于基督教。托瓦也批评：“‘民族志哲学’背后蕴藏的并不是所谓的非洲哲学，反倒是神学。”^④甚至可以说，20 世纪 50—70 年代的“民族志哲学”只是基督教的婢女，先入为主地主张非洲应接受基督教价值体系，故仍不能算为哲学。在这里，我们应强调，尽管少有学者专门揭示卡加梅和基督教的关系，但如前面第三部分所详述，对“民族志哲学”背后宗教色彩的批评大体适用于卡加梅的《比较班图哲学》。

第二，“民族志哲学”对哲学的预设过于集体化和固化。“民族志哲学”往往预设

① Pathé Diagne, *L'Europhilosophie face à la Pensée du Nègro-africain*, Dakar: Sankoré, 1981. 由这部著作起，“欧化派”（Europhilosophie）便用来指某些否定“民族志哲学”尝试的非洲学者。

② 根据洪通吉在晚年回忆录中的叙述，卡加梅在被友人问及如何看待洪通吉的批评时笑称：“洪通吉？这难道不是一个白人吗？”从这一轶事可见，卡加梅是了解当时非洲思想界各派争论的，并把洪通吉的哲学观视为欧洲白人一派。参见 Paulin Hountondji, *Combats pour le Sens. Un itinéraire africain*, Bamenda: Langaa RPCID, 2013, p. 144.

③ Paulin Hountondji, *Combats pour le Sens. Un Itinéraire africain*, p. 80.

④ Marcien Towa, “Conditions d’Affirmation d’une Pensée Philosophique Africaine Moderne,” *Présence Africaine*, No. 117—118, 1981, p. 343.

一个恒定不变，不再在历史时空中演变的集体精神世界。在多位哲学家看来，如此一种“没有哲学家的哲学”的预设本身就需要推敲。对他们来说，哲学应是不同时代的个体以理性进行反思的产物，而非洲哲学应是个体理性反思形成的书面文本。洪通吉就认为，不应庸俗化哲学的定义，将其视为广义上“个人或集体应用到日常实践中的智慧”^①。因此，“民族志哲学”仅呈现出某种集体自发的世界观，还没有上升到反思的高度。而且，它的预设也忽视了哪怕是集体的世界观也完全有可能随时代而变迁。

第三，“民族志哲学”在方法上欠严谨。由于没有现成的文字记载，它不得不依赖论者个人对某一部族的精神世界进行主观重构，且往往在诸如“存在”“因果”“个体”“自由”等西方概念的视野下来裁量非洲精神世界，不知不觉陷入了以西论“非”的窠臼。针对卡加梅对班图语言材料的运用，托瓦就指出：“卡加梅的方法看似严谨，但难道欧洲人可以仅仅从他们的语言结构中就提炼出欧洲哲学吗？”^②肯尼亚哲学家迪斯马斯·马索洛（Dismas Masolo）也在肯定卡加梅之贡献时提出不同意见：日常层面的使用语言区别于哲学层面，而且同一词汇在不同层面很可能会有不同含义，因此卡加梅对普通班图人使用的日常用语进行提炼而得出的“哲学”不一定对应哲学层面的概念推演。^③

第四，“民族志哲学”折射出部分非洲人的病态心理。在面对西方的态度上，这种病态心理体现出某种为了洗刷自卑感的焦虑。怀着人有我有，且非洲哲学异于西方哲学的心理，一味往传统找答案的姿态既意味着非洲人急于获得西方人承认，客观上也迎合了西方人的思想猎奇。而在面对非洲传统的态度上，布拉加指出，这种心理会制造某种陷阱，让一厢情愿的非洲复古派在非洲国家独立之初以为“仅凭思辨活动就能复原过去传统中的某个时刻”^④，转移他们本该正视国家落后现实，推动国家社会发展的注意力，耽溺在整理国故的幻觉中。

（二）对“欧化派”的反驳要点

第一，进行哲学思考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不必奉西方开创的传统为金科玉律。对于洪通吉、托瓦、布拉加等人对“民族志哲学”在取材上不严谨的指责，有学者反驳：如果只有合乎西方自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传统才算严谨，且非洲本土素材从一开始就被非洲人认定是低一等的民间风俗，那么这才是彻底的以欧论“非”，盲目以欧洲标准来评判非洲思想。那种看似要求严谨，实质一切为西方马首是瞻的评判标准阻碍了对卡加梅等“民族志哲学家”贡献的客观评价。而且，喀麦隆哲学家让-哥德富瓦·比迪马（Jean-Godefroy Bidima）提醒，就连“欧化派”所倾慕的当代西方哲学其实也并不拒斥人类学，因为诸如卡西尔、梅洛—

① Paulin Hountondji, “Histoire d’un Mythe,” *Présence Africaine*, Vol. 3, No. 91, 1974, p. 4.

② Marcien Towa, “Conditions d’Affirmation d’une Pensée Philosophique Africaine Moderne,” p. 344.

③ Dismas Masolo, *African Philosophy in Search of Identity*, pp. 95—102.

④ Fabien Eboussi Boulaga, *La Crise du Muntu*,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1977, p. 156.

庞蒂、维特根斯坦等西方名家都不同程度向民族志汲取过养分。^①换言之，“欧化派”固守的更像是一种过时闭塞的不宽容心态，无助于非洲哲学的健康展开。

第二，“欧化派”对“民族志哲学”的标签过于宽泛，忽视了著作之间的具体区别。哪怕同样是在非洲民俗、谚语、神话、语言等素材中提炼哲学，不同思想家切入的角度、写作的动机、运用的方法都各有不同。遭猛烈批判的“民族志哲学”并非铁板一块，不宜对它们一概而论。喀麦隆思想家迈拉德·赫布加（Meinrad Hebga）提出：“那些自以为公正科学的批判……不应把某种整体判断套入具体某部作品中，而全无对该作品作详细、令人信服的分析。”^②在他看来，在缺乏对具体著作进行仔细分析的情况下，“欧化派”难以准确把握每部“民族志哲学”著作背后的世界，导致他们的批判往往无的放矢、粗疏笼统。以今天的眼光观之，除青年时期的布拉加以长文《成问题的班图人》^③一字一句剖析过唐普尔《班图哲学》外，洪通吉、托瓦、布拉加三人甚少撰文对“民族志哲学”有代表性的本土著作进行过辨析和细察。

第三，非洲人应重视以人类学和语言素材入手的哲学研究方式。事实上，就连长时间对“民族志哲学”持否定态度的洪通吉也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认识到卡加梅从语言学角度提出“四范畴”说的重大意义，盛赞这一发现将为非洲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打下基础。而到了晚年，洪通吉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修正自己早年的观点，把卡加梅描述为“非洲第一位哲学家”！^④而在独立后的非洲学院派英语圈，哲学工作者并不反感从本土语言素材提炼概念，例如尼日利亚哲学家、语言学家恩提特·穆肯迪（Ntite Mukendi）便始终强调研究非洲语言的重要性，认为通过研究语言可以更好理解非洲人的世界观和哲学思想。在肯定卡加梅开创性工作的基础上，他认为对非洲语言结构的详细分析可以揭示非洲哲学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深层结构和逻辑。^⑤又如，加纳哲学家夸西·维雷都（Kwasi Wiredu）从阿肯人的语言挖掘出阿肯人的世界观，并以此与英语中的观念对勘比较。^⑥在维雷都看来，非洲英语圈对“民族志哲学”（英语世界彼时亦使用 Folk Philosophy 一词）并没有像法语圈那样持剑拔弩张的争论态度，而是较为平和地把它视为传统非洲哲学。^⑦

① Jean-Godefroy Bidima, “Philosophies, Démocraties et Pratiques: à la Recherche d’un «Universel Latéral»,” *Critique*, Vol. 8, No. 771—772, 2011, pp. 665—667.

② Meinrad Hebga, “Eloge de l’«Ethnophilosophie»,” *Présence Africaine*, Vol. 3, No. 183, 1982, p. 25.

③ 青年留学时的布拉加于 1969 年发表该文，参见 Fabien Eboussi Boulaga (1969), “Le Bantou Problématique,” in Fabien Eboussi Boulaga, *L’Affaire de la Philosophie Africaine: Au-delà des Querelles*, Paris: Karthala, 2008.

④ Paulin Hountondji, *Combats pour le Sens. Un Itinéraire africain*, p. 76.

⑤ Ntite Mukendi, “Langues Africaines et Vision du Monde (La Philosophie Bantou Comparée d’Alexis Kagame),” pp. 91—92.

⑥ Kwasi Wiredu, “The Concept of Truth in Akan Language” in Kwasi Wiredu (ed.), *Cultural Universals and Particulars: An African Perspectiv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07—109.

⑦ 夸西·维雷都：《我们这个时代的非洲哲学》，朱慧玲译，载《世界哲学》2017 年第 2 期，第 9 页。有关加纳哲学家维雷都的思想研究，参见邓皓琛：《概念去殖民化、社群主义和共识民主——论夸西·维雷都在非洲政治哲学中的“破”与“立”》，载《政治思想史》2025 年第 1 期。

四、评价和启示

卡加梅积 20 年之功以《比较班图哲学》呈现整个班图地区的集体世界观，间接引发“民族志哲学”和“欧化派”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非洲是否存在哲学的争鸣。20 世纪 90 年代起，这场争鸣逐渐偃旗息鼓，成为非洲当代哲学史中业已翻过的一页。21 世纪以来，非洲学者很少再会质疑非洲哲学书写。他们大多主动梳理和解读各地传统，或为其赋予当代意义，或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对熟悉西学的中国读者来说，如何评价卡加梅的主张及整个“民族志哲学”争鸣，归根到底还是要回到哲学在全球版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张力上来。无需赘述，中国读者已了解 20 世纪以来欧洲思想界反思自身局限的佳作，如阿多诺对同一性的警惕、列维·斯特劳斯对无意识结构的揭示、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乃至近年哈贝马斯对作为复数的现代性的体认；也了解来自其他文明的知识精英对待西方的态度，如萨义德对欧洲东方学的批判、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对西方政治现代性能否适用于印度的质疑、丸山真男（Masao Maruyama）的“超克”论。成名于比利时殖民时代、成熟于卢旺达独立时期的卡加梅让我们看到非洲思想内部的复杂线索，它交织于白人传教士的无心插柳、中南部非洲多地未经挑明的思维公约数和本土知识精英对待欧洲及基督教的不同态度之间。以下我们从三方面评价卡加梅的思想贡献，并略论对中国学界的启示。

第一，卡加梅是首位敢于以学理方式打破欧洲对非洲哲学话语霸权垄断的非洲本土思想家。必须看到，卡加梅的贡献并不局限于单纯判定非洲哲学的有或无、诞生时间的早或晚，而更在于他以不卑不亢的态度与欧洲殖民者和传教士有关非洲的哲学知识积累进行理性对话。他在《比较班图哲学》中以翔实证据更正包括唐普尔在内的多位传教士著作中的偏颇观点。因此，前述个别“欧化派”对整个“民族志哲学”欲在西方面前证明自己、一洗自卑心态的指责至少并不适用于卡加梅，因为他本人就批评部分非洲神父看不起非洲本土传统，陶醉于“欧美化”的自我矮化的病态心理。相反，卡加梅对西方的知识积累和对非洲本土传统的态度始终是中肯的、不媚外的。可以说，对数量庞大的殖民知识著作进行辨析和区分良莠，并批判性借鉴非洲同行的研究成果，这是卡加梅为非洲思想实现去殖民化的重大贡献。

第二，卡加梅对本土语言素材的重视为后人研究非洲思想起到正面示范作用。对非洲独立以来包括卡加梅、维雷都、肯尼亚的亨利·奥鲁卡（Henry Oruka）^① 在

① 我国最早研究奥鲁卡思想的学者是张宏明，参见张宏明：《非洲智慧哲学解析》，载《西亚非洲》2002 年第 3 期。有关奥鲁卡思想在整个非洲思想版图的定位，参见李安山：《当代非洲哲学流派探析》，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0 年第 2 期，第 139 页。有关奥鲁卡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参见 Henry Oruka (ed.), *Sage Philosophy: Indigenous Thinkers and Modern Debate on African Philosophy*, Leiden: Brill, 1990。

内的多位在欧洲接受过哲学训练的本土思想家来说，谚语、史诗、故事乃至词汇结构等素材是进入精神世界的不二法门。无疑，研究者需要认真斟酌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既应带着有普遍性的问题意识去审视某一特定群体，避免主观裁断；同时又应在语言素材中挖掘出该群体独特的思维方式，避免戴着欧洲人的有色眼镜来打量非洲。在我们看来，前述个别“欧化派”对“民族志哲学”无法仅从语言结构提炼出哲学的指责不完全适用于卡加梅，因为《比较班图哲学》只有一小部分篇幅涉及严格意义上的班图语法结构，并据此结构提炼出“四范畴”说，其余篇幅更多是梳理核心观念词汇在各地的共性。事实上，在缺乏书面文本的情况下，研究者能依傍的首先便是包罗万象的语言素材，这恰是懂语言，接地气的非洲本土思想家的优势和应该担当起的使命。用今天的眼光看，卡加梅走出了一条为后来大多数当代非洲学者继承发扬的研究路径。

第三，卡加梅为基督教“选边站队”折射其思想局限。如第一、二部分所述，卡加梅的基督教立场和 20 世纪上半叶卢旺达统治者规定天主教为国教密不可分。他的个人信仰无可厚非，但《比较班图哲学》在班图传统和基督教两大体系之间并无给出后者在非洲逐渐取代前者的详细理据。哪怕卡加梅已区分开独属信仰层面的基督教和技术上高人一筹的欧洲文明，但遗憾的是，他一厢情愿对基督教在班图文明生根发芽寄予厚望。恰是这一思想局限，折射出卡加梅无力，也无意对本土传统赋予适应现代社会的新转换。

行文至此，钩沉卡加梅的思想及梳理“民族志哲学”的争鸣对中国学界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启发。首先，在研究非洲哲学层面，应尽可能从非洲主体出发，理解诸如非洲与西方、非洲内部等不同层次和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对话和争鸣。受殖民和客观历史条件影响，非洲哲学的源与流难免带有西方文明或外来宗教的因素，我们应共情非洲思想家在摆脱欧洲殖民知识束缚上的迫切心理，准确把握他们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张力面前的侧重和立场。其次，在世界思想版图层面，应重视非洲哲学独特的观念和讨论方式，推动世界哲学的多样化。我们应摆脱西方思想是中国唯一强势对照者和对话者的思维惯性，以虚心包容的心态打量非洲丰富的传统思想资源和充满生机的当代诉求，树立对另一个“他者”的尊重和理解。最后，在中非文明互鉴层面，应找准中非哲学的对话点和比较点，促进中非人民心相连、情相通。我们应推进对非洲思想体系的梳理研究，准确把握中非在当代思想历程中的异同，耐心聆听非洲哲学的筌路蓝缕，以非洲同行听得懂、听得进的表述传递好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成果。

（责任编辑：赵司空）

world of objects. He argues that language is not merely a tool for assigning names to pre-existing objects but a fundamental medium for constructing reality itself. Language contributes not only to the creation of theoretical worldviews but also to the shaping of practical and ethical volition.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and imaginative worlds also relies on language. Cassirer emphasizes that language is not a mere representation but a creative and constructive force, permeating every layer of human cognition and spiritual activity.

Key words: language; world of objects; spirit; construction

- On the Linguistic Foundation of Human Cognition

CAI Shushan

Abstract: In the 20th century, humans conducted unprecedentedly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language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ir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o the mid-1970s, Wittgenstein, E. Sapir, B. L. Wolf, N. Chomsky, J. L. Austin, and John R. Searle, among others, successively explored in the fields of human language and human mind, forming a continuum of human language cognition. The outcome of this movement was the birth of cognitive scie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ognitive science enables us to conduct more in-depth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human language. The most significant significa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ognitive science is to break the boundaries of disciplinary division that have existed for two thousand years, and shift human cognition to a new era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entered on problems. Only language, and language alone, can becom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s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ese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great human transformation, and this is being confirmed by the development and breakthroughs of AI intelligent software based on Chinese, such as DeepSeek. In the AI era, Chinese has unique innovative advantages. Cognitive science has arrived, and the centu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has arrived!

Key words: linguistic turn; language foundation transformation; language cognition; cognitive science

- The Thought of Alexis Kagame and the Debate on Ethnophilosophie in Africa *DENG Haochen*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his critique of the Belgian missionary Placide Tempels, the Rwandan thinker Alexis Kagame, by studying linguistic materials, outlines six aspects of the Bantu philosophy in his *La Philosophie Bantu Comparée*: category, creator, vital principle, vision of history, ancestor worship and goal of man, in an attempt to justify the existence of an African philosophy. Echoing the contemporary evolution of Christianity, Kagame, in accord to the key concepts of Bantu's philosophy, cautiously suggests that Christianity should adapt its missionary approach to better take root in Africa. Kagame'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has sparked a heated debate in African philosophical circles about Ethnophilosophie. Critics argue that Ethnophilosophie represented by Kagame was not rigorous and it served the purpose of Christian proselytism, whereas supporters indicate that such a philosophical school, freed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European thought, was a genuine beginning for African philosophy. Despite his limits of a particular era, Kagame's thought and the related debate can enrich our scholarly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 and currents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philosophy as well as bring new inspirations to the research in China.

Key words: Alexis Kagame; African philosophy; Ethnophilosophie

- Epistemological Puzzles Related to Three Types of Intuition about the Future

XU Yingjin YUAN Zheng

Abstract: Regarding future events, many may have the following three types of epistemological intuition: the indeterminacy intuition (i.e., Aristotle's sea battle case), the determinacy intuition (intuitions about the stability of some fundamental aspects of the world), and the fuzzy intuitions concerning easy foreknowledge, as formulated in the so-called "Milk Case" and "Beth Case". Kitarō Nishida offers at least